

一二九运动动员机制的历史考察

■ 程莉婷 郑传芳

(福建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0)

【摘要】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引领与组织推动,民族危机与社会矛盾的全面激化,青年爱国的文化特质与时代先锋作用,是一二九运动动员机制的形成背景;议题生成机制,舆论传播机制,示范扩散机制,组织发动机制,是一二九运动动员机制的主要构成;一二九运动中,党的政治引领激发了青年在决策动员中的主体性,党的宣传方针引导青年在社会动员中展现主体性,党的统一战线法宝推动青年在跨阶层联结中彰显主体性。坚持党的领导与青年主体性的有机结合,创新青年动员方式和宣传渠道,推动青年把知识与能力服务于民族解放和民族复兴伟业,是一二九运动留给我们的宝贵历史经验与当代启示。

【关键词】一二九运动 动员机制 青年群体

一二九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从学生自发抗争转向全民抗战的关键转折点。它打破了“救亡图存”仅局限于社会精英的旧格局,凭借青年学生的先锋作用,将抗日烽火从校园引向街头、工厂与乡村,有力推动了民族意识的广泛觉醒。当前,学界关于一二九运动的研究多聚焦党的坚强领导、青年学生的爱国行动以及运动的组织方式等方面。这些成果揭示了青年在抗日救亡中的积极作用,但对于青年主体性在党的领导下如何被激发并转化为有组织的社会行动,尚缺乏系统深入的阐释。本文以青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积极投身抗日救亡的历史进程为切入点,通过还原青年群体在议题生成、舆论传播、组织发动与示范扩散等动员机制中的实践,阐明其在民族危机中由“被动员对象”成长为“自觉行动者”的历史逻辑。文章旨在揭示青年如何在党的政治引领下,把爱国热情升华为自觉担当,把分散抗议凝聚为纲领明确、方向统

收稿日期:2025-05-15

作者简介:程莉婷,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中共党史党建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郑传芳,教授,博导,中央马工程思政课重点教材编写组首席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教育部全国高校思政课教学指导委员会咨询委员,福建省高校思政课教指委主任,主要研究中共党史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基金项目:本文系福建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2021年重大项目“党的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研究”(课题编号:FJ2021XZWTZ05)、2022年度福建省社科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红色文旅助推福建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研究”(课题编号:FJ2022JDZ02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一的群众性运动,总结党的领导与青年主体性相统一的历史经验。这不仅有助于深化对中国革命进程中党群关系的理解,也为当代如何激发青年历史主动精神、把青年力量凝聚到民族复兴伟业中去提供重要启示。

一、一二九运动动员机制的形成背景

一二九运动动员机制的形成,既是对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直接反映,也是青年学生在国家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发挥自身文化优势和社会影响力的救国回应,更是中国共产党发挥政治引领和组织推动作用的必然结果和集中体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青年学生救亡图存的政治觉醒和使命担当,这些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汇聚成推动一二九运动的强大力量。

(一)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引领与组织推动

一二九运动的形成与发展,绝非偶然的学生自发行动,而是在中国共产党政治引领、组织领导和行动推动下所形成的必然结果。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引领是青年动员走向自觉、形成统一斗争目标的决定性因素。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华、华北危在旦夕的严峻局势,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明确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建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这一纲领性文件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策略方针的转变,迅速在全国传播,为青年学生的动员提供了思想武器和明确的政治方向。在地下党组织的有力发动和党员的努力推动下,青年学生的爱国行动由零散的抗议转变为政治目标明确的自觉的民族救亡运动,提出了“反对华北自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一系列鲜明的斗争口号,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历史关键时期的政治号召力和组织领导力。正如毛泽东后来指出的,“没有共产党作骨干,一二九运动是不可能发生的”^[1]。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危亡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抗日救亡道路的正确指引,为一二九运动提供了坚强的思想引领,成为这场伟大的学生爱国运动的领导力量和精神动力。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领导是一二九运动动员机制得以构建的重要保证。党的地下组织在北平学联、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等学生组织中发挥领导作用,地下党员发挥了重要骨干作用,确保了党的抗日主张和策略方针能够唤醒青年学生的觉悟,激发青年学生救亡图存的热忱。通过政治教育和组织训练,党培养和锻炼了一批政治坚定、能力突出的学生运动的骨干,使他们成为运动的中坚力量,有效增强了学生抗日救国行动的社会影响力与号召力。在党的领导下,学生组织能够统一行动、协调配合,积极推动运动向全国扩展。在一二九运动和“一二·一六”两次大规模示威后,党领导下的北平学联组织学生南下宣传团,突破封锁,深入华北城乡,广泛传播抗日救亡主张。这一举措有效推动了抗日思想的全国性传播,扩大了运动的社会基础,形成了全国范围的抗日救亡新高潮。

中国共产党的有力支持和保障是一二九运动动员机制在极其艰难环境中发挥作用的重要条件。红军长征的胜利,经由党的宣传和进步报刊的报道,极大地增强了青年学生的抗日信心,

为北平和全国其他地区的学生提供了精神鼓舞。与此同时,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和地下党组织积极参与各校学联和学生自治会的工作,在宣言起草、纲领制定、口号拟定以及游行筹划等方面提供帮助和指导,使学生抗争目标从单纯的爱国呐喊上升为具有明确政治指向的行动纲领。此外,面对国民党当局残酷镇压,党的干部在危急关头多次保护学生领袖^[2],确保运动核心力量的延续,避免运动遭受重大损失。这些及时有效的强力支持和密切配合,使得一二九运动能够在国民党当局白色恐怖的高压下坚持开展。

(二)民族危机与社会矛盾的全面激化

一二九运动动员机制的形成,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多种社会因素相互作用的必然产物。

民族危机空前加剧是一二九运动动员机制形成的直接触发因素。自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强占东北后,又通过《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等不平等条约蚕食华北,策划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妄图制造第二个“满洲国”。这种有计划的侵略中国的图谋,把民族危机由局部推向了全国,使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正是在这种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局势下,广大青年学生深切感知到亡国灭种的危险。在国家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学生们将忧患与愤慨转化为强烈的爱国行动,汇聚成投身救亡运动的磅礴力量,有力推动了一二九运动的爆发。

国民党当局实行不抵抗政策是一二九运动动员机制形成的重要催化因素。面对日本的侵略,国民党当局却采取消极不抵抗政策,对日一再妥协退让。在东北,日军侵占我大片国土,而国民党军队却奉命撤退,致使东北三省沦陷;在华北,日军步步紧逼,国民党当局却依然未采取有效措施,导致日军侵略气焰愈发嚣张。这种不抵抗政策纵容了日军加快侵略步伐,使国土不断沦丧,严重打击了民众的抗日热情,激起民众的强烈不满。尤其是青年学生等群体痛感国土的丧失,深刻认识到国民党当局的软弱无能。他们的愤怒、失望与爱国热情汇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促使他们积极行动起来,推动了动员机制的加速形成。

国民党统治下社会矛盾的全面激化为一二九运动动员机制形成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基础。世界经济危机冲击中国,农民破产,工人失业,民族工商业凋敝,而官僚资本乘机巧取豪夺,广大民众与师生生活极其困难。蒋介石集团奉行“攘外必先安内”,一方面对日妥协退让,另一方面加紧白色恐怖,血腥镇压爱国运动,甚至颁布《邦交敦睦令》等多项镇压爱国运动的法令,强调“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3]。社会矛盾使学生斗争逐渐突破校园限制,走向社会,与工农群众运动形成呼应。

(三)青年爱国的文化特质与时代先锋作用

青年学生高昂的爱国热情和善于宣传的文化优势,是一二九运动动员机制形成的重要基础。作为当时社会中文化程度较高的学生群体,他们不仅有一定程度的文化知识功底,而且熟悉白话文、刊物、演讲、戏剧等多种传播方式。面对国民党当局对新闻出版和言论发表的严密管控,学生群体通过刊物、传单、街头演讲与歌咏等多种形式,把“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反对华北自治”等政治主张转化为街头巷尾的现实话题,使抗日救亡的呼声突破了禁令压制,广泛传播于社会各界。学生在街头演出话剧《放下你的鞭子》,以艺术形式揭露侵略与卖国,直击观众心灵^[4];他们的口号声、歌曲声、旗帜标语将救亡呼声传递到社会各界,形成震撼人心

的政治动员^[5]。

青年学生炽热的爱国激情和以身许国的果敢行动激起强烈的社会共鸣,推动了一二九运动动员机制的广泛形成。学生率先走上街头,在寒风中坚持游行、面对警棍坚守队列、被捕后仍高呼抗日口号等具体行动,展现了青年学生“以身许国”的斗争精神。特别是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的英勇抗争,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引发连锁反应。从12月11日开始,天津、上海、南京、武汉、开封、广州、杭州、西安、济南、青岛、南宁、长沙、安庆、厦门等大中城市相继爆发学生抗日集会和示威游行^[6];国际学生联合会也向全世界学生发出“中国学生的斗争,也是我们的斗争”的号召,苏联、美国、英国、西班牙、埃及、印度等国的青年学生组织或个人纷纷打来电报,积极声援中国学生的伟大斗争^[7]。12月12日,上海文化界爱国知名人士沈钧儒、马相伯、陶行知等发表《救国运动宣言》,27日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国会^[8]。青年学生和社会舆论中已经从“知识拥有者”转变为“民族命运承担者”,这一转变直接冲击了社会对学生的“书生气”“脱离实际”等的刻板印象。当市民群体在街头目睹青年学生甘冒风险、声泪俱下地呼吁起来抗战时,抗日主张在部分市民中逐渐超越了遥远的政治口号,转而成为与家国存亡和民族兴衰情感相关的动员点。学生这种以生命与热血为代价的勇敢行动,唤起了整个社会的强烈共鸣,对国民党不抗日的妥协政策施加极大的舆论压力,使民族危机在社会层面上转化为全民关注的问题。可以说,学生的爱国行动成为点燃社会抗日激情的火种,其高度的政治感召力推动了一二九运动动员机制的形成。

二、一二九运动动员机制的主要构成

在一二九运动中,青年学生在党的政治引领下,把炽热的爱国热情转化为体系化的动员机制,推动了抗日救亡由校园走向社会、由自发抗议走向全民抗战。他们通过议题生成机制,把“反对华北自治”“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核心政治主张凝聚为广泛的社会共识,明确动员的主题;通过舆论传播机制,以报刊、演讲、歌咏、文艺等多样形式,营造动员的声势;通过组织发动机制,依托学生自治会、救国会和学联建立起纵横结合、分工明确的组织网络,突破国民党当局的专制控制,形成动员的组织系统;通过示范扩散机制,以率先觉悟、勇于牺牲的实际行动和榜样力量,带动社会各阶层广泛响应,提供动员的榜样。由此构建起政治整合、舆论引导、组织发动和社会动员相统一的整体动员机制与格局,充分展现了青年在民族危机中的先锋作用与党的动员战略的深度契合。

(一)议题生成机制

面对华北危机与民族存亡的严峻局势,青年学生在党的引领下,敏锐把握形势变化,旗帜鲜明地提出“反对华北自治”“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政治口号,表明运动的核心政治主张,构建起以明确的口号与议题为牵引的动员机制,唤起了最广泛的社会共鸣。他们通过宣言发表、街头游行和文艺宣传等多样方式,推动了从口号提出、议题生成走向价值共识的转化,把分散的个体的救国忧患意识凝聚为全民抗战的共同的救国追求,激发了全国的抗战热潮。

学生群体率先将反对华北殖民化、捍卫国家主权确立为核心议题。针对日本通过《何梅协

定》《秦土协定》逐步蚕食华北主权的阴谋,学生们在1935年12月9日的游行中高呼“反对华北自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直指日本策划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这一傀儡政权的阴谋。他们更以殷汝耕成立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为典型案例^[9],通过印发传单、组织宣讲等方式揭露其叛国本质,要求国民政府立即武力讨伐汉奸政权。这些行动不仅揭露了日本“以华制华”的殖民策略,更唤醒了民众对领土完整的危机意识,为全民抗战的议题框架奠定了坚实基础。

学生群体将停止内战确立为重要口号和政治议题,旗帜鲜明地反对国民党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作为一二九运动的核心口号,强烈反对国民党政府压制抗日救亡运动和持续推进军事“剿共”。1935年12月发布的《告全国民众书》明确指出,青年学生必须认清“安心读书”只是麻痹意志的安眠药,强调武力抵抗“不但是依赖负有守土之责的长官,尤其希望全体民众,也都能一致奋起,统一步伐,组织起来,实行武装自卫”^[10],强调民众在抗战中的主体作用,呼吁唯有停止内战、举国抗敌,才是民族解放的出路。这一政治立场直接否定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逻辑,凸显出学生运动在揭露卖国政策、凝聚社会共识、推动全民抗战中的独特作用。

学生群体通过“争取政治自由”的议题,将抗日救亡与民主诉求有机结合起来。1931年,国民党政府颁布《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以“危害民国”之名滥施镇压,将一切反对派、进步人士甚至要求抗日民主的呼声视为“罪行”。沈钧儒、邹韬奋等“七君子”,陈独秀以及国民党左派领袖邓演达等相继被捕。这一法令成为国民党压制民主、扼杀人民抗日热情的工具,也成为青年学生揭露卖国政府专制统治的重要论据。一二九运动提出的“争取救国自由”“保障爱国民主权利”等纲领性口号与主张,有力冲破了“爱国有罪”的白色恐怖氛围^[11]。一二九运动已经超越了单纯的爱国示威,成为对当权的专制政府的民主抗争,青年学生运动由纯粹的反侵略诉求转向具有明确政治纲领的群众运动,反映出中国共产党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主张在青年中的深入传播成效。

一二九运动的议题生成机制,紧紧围绕当时社会主要矛盾,体现民众救国强烈愿望,并呈现出从民族危机到抗日救国的思想统一和价值共识的过程。以华北危局为切入点,将废除专制法令、保障政治自由等诉求与救亡图存相结合,使原本分散的爱国情绪升华为追求民主与民族解放的统一价值,为社会政治力量整合奠定了广泛思想基础。

(二)舆论传播机制

一二九运动的广泛动员,依赖于一套多层次、全方位的舆论传播机制。青年学生在党的引领下,充分运用报刊、演讲、传单、歌咏和文艺演出等形式,把抗日救亡的呼声传递到社会各个角落。这些宣传手段相互配合,既扩大了运动的影响范围,又增强了社会动员的感召力,为形成全民族抗战的舆论声势和思想基础提供了有力保障。

报刊出版构成舆论传播的重要阵地。在国民党严密控制社会舆论的背景下,学生利用校内外刊物持续发声,刊载时评与宣言,推动抗日救亡思想的传播。《怒吼吧》创刊号刊登的《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中写道:“‘安心读书’只是一帖安眠药……为了民族,我们愿意暂时丢开书本,尽力之所及,为国家民族做一点实际工作。”^[12]同时,《申报》《南宁国民日报》《武汉日

报》等也纷纷刊登来自学校和团体的抗日宣言。学生们以白话文,向大众剖析民族危机、日军侵略阴谋和政府妥协行为,把崇高的民族大义转化为通俗的政治呼吁。报刊连续性的出版,为思想传播与舆论动员提供了稳定而高效的渠道。

采用演讲和集会等最具感染力的传播方式。学生代表走出校园,在街头、厂区甚至乡村集会中发表演说,以充满激情的语言唤醒普通民众的民族意识。在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引导下,北平、天津等地举办多次大规模集会,围绕“国民政府是否抗日”等现实议题展开公开辩论^[13]。1935年12月底,平津学联组织南下扩大宣传团深入农村,学生在与贫苦农民交流中,认识到反帝反封建的一致性,宣传内容也因此更加贴近现实。例如,第三团在马头镇宣讲时指出,农民贫困的根源是帝国主义侵略与封建地主的剥削,并直指蒋介石政府实为帮凶,讲到动情处不少农民潸然泪下,高呼“干掉这些日本鬼子”,宣传效果十分显著^[14]。这类活动不仅传递了信息,更凝聚了民众的情感,使救亡从口号转化为广泛的政治共识。

广泛散发传单与标语,有效扩展了舆论传播覆盖面。学生们自发编印传单,在街头、火车站、工厂广泛散发。例如,在“一二·一六”大游行中,清华大学队伍沿途散发传单和张贴标语^[15]。南下宣传团第三团在窦店火车站登车宣讲,并在车厢外刷写口号,将“反对华北自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主张迅速传播至不同社会群体^[16]。这些文本简洁有力、朗朗上口,易于被群众接受和记忆,形成强烈的视觉和心理冲击,不断强化形势危急的紧迫感。

以生动直观的文艺宣传形式,使舆论传播更具感染力。学生利用话剧、歌曲、漫画等艺术手段,编排如《打回老家去》《放下你的鞭子》等剧目,在街头、茶楼、集市演出,形象揭露日寇暴行与政府无能。南下宣传团在马头镇演出时,有老人当场高呼“齐心打日本,不做亡国奴!”^[17]歌咏活动同样广泛开展,《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等抗日歌曲在校园和社会上广为传唱^[18]。这些活动寓教于乐,打破文化水平限制,激起普通民众的强烈共鸣和参与热情。

此外,通讯联络在推动形成全国范围的响应浪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北平学生通过宣言、电报和信函,把抗日救亡的声音传递到全国各地,迅速引发各大城市学生的集会和游行,形成南北呼应、同声共振的爱国潮流。这一宣传与联络网络,不仅拓展了斗争的地域范围,也凝聚了全国救亡力量的共同意志,使一二九运动从地方学生行动发展为席卷全国的抗日浪潮,充分彰显了青年学生在党的领导下所展现的政治感召力和历史担当。

(三)组织发动机制

一二九运动的迅速爆发与广泛推进,得益于青年学生在党的领导下形成了一套系统严密、多层联动的组织发动机制。这一机制以校内组织为基础、跨校联合为框架、职能小组为执行单元,依托党员为核心骨干与广大学生相结合的动员体系,实现了从分散行动到集中发力的高效转变,为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奠定了组织基础。

校内学生组织构成了纵向动员的基本单元。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燕京大学等高校通过“学生自治会”和“抗日救国会”这类合法组织,在日常活动中凝聚共识,并在危急时刻迅速转化为行动核心。他们不仅关注学生生活,还积极创办《学联日报》《北平学生》等刊物,突破舆论封锁,增强集体认同。一旦发生重大事件,如日本增兵华北,各校能迅速召开代表大会,形成统一决议,组织全校响应。北京师范大学就曾通过自治会紧急会议决定“集中

全校同学力量,一致奋起,为中华民族争取最后之生机”^[19]。这种校内纵向组织,构成了组织发动机制的根基。

跨校联合形成了横向扩展的关键支撑。面对民族危机,北平、天津等地迅速成立学生联合会,统一指挥、协调行动。学联负责制定纲领、统一口号与时间,将各校力量整合为整体运动。1935年12月,北平学联在获悉当局欲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后,立即成立示威指挥部,成功组织万余名学生于12月16日发起联合游行^[20]。在之后的“六·一三”游行中,学联也统筹调度各校队伍,甚至派出清华先遣队与东北大学学生汇合,形成强大合力。学联不仅是横向联合的中枢,也成为学生与社会沟通的桥梁,使组织发动机制突破校园范围,转化为全民性政治动员。

职能小组高效执行了组织发动任务。在学联与各校组织之下,设有职能明确的任务小组,保障运动有序推进。总务、宣传、纠察、交际、救护等组别分工协作,形成专业化运作体系。宣传组负责撰写传单、组织演讲,如“一二·一六”游行中的宣传品多由北大学生救亡宣传委员会拟定^[21];纠察组维持秩序、应对冲突,如在“三·三一”追悼死于狱中的爱国学生郭清活动中,有效抵制军警破坏^[22];救护组则由北平医学院等专业学生承担伤员救助任务。这一层级清晰、分工明确的机制显著提升了组织效能,避免了运动流于松散,体现出高度的组织水准。

党的政治引领为组织发动机制注入了根本动力。中国共产党通过民族解放先锋队等秘密骨干在学联和各校组织中担任核心角色,确保运动始终沿着党的抗日主张推进;普通学生则构成行动主体,推动运动形成浩大声势。在党的引导和学联联络下,运动进一步向社会扩展,文化界、工人界和市民纷纷响应。鲁迅撰文赞扬学生行动^[23],宋庆龄捐款资助学联,上海救国会及各界名人公开声援,称学生运动为“全国大众一致奋起救亡图存的先导”^[24]。冼星海等创作救亡歌曲激励民众,全国学联和各界救国联合会也相继成立,表明组织发动机制已经由地方层面扩展为全国范围的抗战动员体系。

(四)示范扩散机制

一二九运动之所以能够形成广泛影响,根源在于青年学生在党的领导下形成的示范扩散机制。他们以具有高度组织性的实际行动担负起抗日救亡的先锋角色。学生行动不仅具备强烈的政治冲击力,而且通过严密的组织与牺牲精神形成广泛的社会动员和示范效应,推动运动从局部扩展至全国,成为整个动员机制有效运行的关键支撑。

学生的率先觉悟和勇于斗争具有鲜明的示范效应。在中共北平临委的领导下,北平学联于1935年12月秘密筹划并发动请愿游行,学联先后发动各校联合通电,通过了《通电表示否认任何假借民意之“自治运动”》和《联络平市大中学校发起大规模请愿》两议案^[25],公开反对所谓“华北自治”,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2月9日,各校学生突破军警封锁走上街头,高呼抗日口号;12月16日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进一步扩大影响,并派代表赴上海、南京、武汉等地发动响应。这些行动公然挑战当局政策,打破社会沉闷氛围,展现出青年率先觉悟、勇于行动的先锋形象。

组织性与纪律性使示范效应得以持续扩散。学生游行分工明确,宣传组、纠察组、救护组、文艺组各尽其职,保持队伍井然有序。北平师范大学等学校还建立起职能细化的常设机构,如

绥远抗敌后援会设立干事会及多个专职部门,系统负责文书、宣传、联络和募捐等工作^[26]。严密的组织使学生运动摆脱以往“一阵风”式的局限,赢得社会更多信任与支持。

广大青年展现出的敢于牺牲精神强化了示范的道义力量。面对军警镇压,游行队伍毫不退缩,流血事件引起社会广泛同情与声援。青年以身体和生命的代价,将“抗日救亡”从口号转化为具身性的道德实践,极大增强了民族救亡诉求的感染力和正当性,推动工人、市民、商人等多阶层民众逐渐认同并支持运动。

跨阶层的社会动员体现了示范扩散机制的纵深推进。他们深入工厂、街头和集市,用演讲、歌咏和街头剧等通俗形式传播救亡理念,激发普通民众的爱国热情。北平、天津、上海等地学生还联合成立救国会,发动罢课和游行,形成南北呼应之势。文化界人士如马相伯等公开发声支援,冼星海等创作救亡歌曲鼓舞民心。南下扩大宣传团更将运动精神传播至农村,突破了地理和群体界限,构建起全民抗战的社会网络。

从作用来看,示范扩散机制在全国范围内产生连锁反应。天津、上海、武汉、南京、开封、广州等地学生相继响应,汇聚成“南北呼应”的爱国潮流。天津十余所大中学校的学生组成游行队伍,随即发动全市罢课,推动运动迅速升级^[27]。上海八十多所学校联合发表宣言,掀起反对华北自治的风潮,283位文化界爱国知名人士发表《救国运动宣言》,形成学校与社会呼应局面^[28]。南京数万学生走上街头,发表《告全国民众书》,并通过记者招待会向全国呼吁团结抗战^[29]。武汉四十余校学生代表召开大会,成立学生救国联合会^[30]。开封万余学生连续游行,并以卧轨四昼夜表达抗战决心^[31]。这一由点及面、多层扩散的动员机制,彰显了青年行动对社会觉醒的巨大推动力,也使一二九运动成为中国近代群众性抗日救亡动员的重要典范。

三、一二九运动动员机制使青年主体性充分展现

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引导与组织领导下,一二九运动不仅是对日本侵略的强烈抗议,更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党所主导的一整套动员机制的集中体现。青年学生在党的引导和推动下,依托学联、自治会等组织架构,形成统一的决策、宣传、组织与联合格局,把分散的自发抗议上升为自觉的整体斗争。正是在这一机制中,青年的主体性得以充分展现,他们以高度的历史自觉和政治担当,推动民族危机意识转化为全民抗战共识,既承续了传统家国情怀,又开创了中国青年在党的领导下投身民族解放和社会变革的新格局,在近代青年运动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一)党的政治引领激发了青年在决策动员中的主体性

青年主体性突出表现在决策动员机制的生成上。面对华北危机与国民政府的消极应对,青年学生在党的抗日救亡主张感召和政治引领下,深刻认识到自身肩负的历史使命和斗争目标,学生运动从自发救亡走向了自觉斗争。他们不再是零散、被动的抗议个体,而是在明确政治方向的指导下主动谋划、统一组织,成了集中有序的集体行动。这一自觉性鲜明地体现在运动的自主发起与统一组织上。1935年11月18日,在中共地下党员的推动和进步学生的积极联络下,北平学联秘密成立^[32],成为凝聚共识、统一领导的核心机构。学联的成立及其后续一系列

重大决策,如确定示威日期,拟定并确立“反对华北自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核心斗争口号,协调各校行动等,均由学生骨干在秘密状态下自主商议决定。12月3日,北平学联在市立女一中召开代表会议,通过反对“自治运动”和发起大规模请愿的决议^[33]。12月6日,北平15所大中学校自治会联合发表《北平各校通电》,明确指出“今日而欲求生路,唯有动员全国抵抗之一途”^[34]。12月8日,北平学联召开了各校代表会议统一部署二十余校的游行口号、时间、路线和队伍分工^[35]。这些举措清晰地表明,青年学生已通过党的政治引领,形成有明确政治目标、有统一组织、有行动纲领的自觉的救亡运动主体,其爱国行动源于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忧患和对中国共产党救国方略的高度认同与自觉实践。

青年群体的主体性水平还表现在其策略灵活性上。他们并非机械执行既定方案,而是根据斗争形势的变化和实际遭遇的阻力,在党的战略策略思想启发下,自主、果断地调整行动计划。最具代表性的事例发生在1935年12月9日。当请愿学生队伍行至新华门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请愿遭拒后,学生们并未气馁或陷入僵持状态,而是迅速、自主地改变策略,将原定的请愿行动立即转变为大规模的示威游行^[36]。他们高呼已确立的核心斗争口号,冲破军警封锁,沿街宣传,将抗日救亡的呼声传遍北平城^[37]。这种因势利导、即时调整的自主决策,正是党的政治引领下青年主体性在决策动员机制中充分展现的生动例证。

(二)党的宣传方针引导青年在社会传播中展现主体性

青年学生的主体性在宣传动员上得到了充分展现。这种主体性并非自发的零散传播,而是在党的宣传方针启发下形成的自觉创新与实践能力。面对国民党当局的严密封锁,他们在党的政治引领下,把抗日救亡主张转化为群众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多种传播形式,使党的主张深入社会各个层面,推动政治理念转化为广泛的社会动员力量。

青年学生在宣传策略上展现出高度创造性。在党的宣传方针引导下,把党的抗日纲领以通俗化、艺术化等形式融入社会生活。抗日救亡歌咏活动不是单纯的艺术表演,而是自觉运用音乐作为政治动员的有效载体。北平清华“海燕歌咏团”演唱《国际歌》《义勇军进行曲》《保卫马德里》等歌曲,通过巧妙借用“各国国歌”获得合法空间,突破白区封锁并广泛传播,相关歌曲还被印成明信片销售二十多万张,形成巨大社会影响^[38]。更具创造性的是将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深入市井生活,使民众在悲愤与热泪中产生共鸣,在口号呼喊中凝聚为抗日行动的现实力量^[39]。学生剧团运用双簧、国难大鼓等通俗形式,把抗日救亡主张送到集市庙会,常常台上台下汇成一片、齐声呼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40]。这种紧贴群众生活、契合大众习惯的宣传方式,充分彰显了青年学生对党的文化动员方针的深刻把握和创造性贯彻,把党的抗日纲领有效转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

青年学生逐步建构起由分散到统一的组织格局。在组织建设方面,以各校学生自治会和救国会为依托,通过北平学联实现跨校协同与统一指挥,并在具体斗争中能够及时设立临时指挥部,并依托学生社团不断拓展动员网络。这一架构既植根于青年长期自治传统的积淀,更是对党的组织原则和群众工作方法的自觉运用与创新实践。以12月8日集会为例,二十余所学校代表在燕京大学体育馆集中,统一划定游行路线和集结地点,并设立总指挥部,下辖交通、宣传等机构,还分为大队、中队、小队,每十人编为一小队,三小队组成一中队,三中队组成一大队,并配

备大队指挥、中队长、小队长以及专门的交通员和宣传员,从而使万千学生的集体行动条理分明、井然有序^[41]。这种层级清晰、分工明确的组织形态,是青年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把宣传动员转化为领导社会行动的重要创造,彰显了其作为历史主体的积极作用。

(三)党的统一战线法宝推动青年在跨阶层联结中彰显主体性

一二九运动不仅是青年学生率先发出的抗日救亡呐喊,更是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策略方针指引下形成的一种跨阶层联结的动员机制。青年学生以高度自觉的行动打破校门藩篱,把抗日救亡呼声广泛传播到社会各个层面,推动党所坚持的统一战线从政治方针转化为现实实践,展现了他们作为联系党与群众的重要纽带的主体力量。

青年学生自觉承担起联系社会各阶层的历史使命。“一二·一六”大示威中,游行队伍所到之处,学生们不断向商店、住户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沿途工人、店员、小商贩乃至人力车夫都纷纷鼓掌喝彩,加入呼喊口号的行列^[42]。天桥地区的工人、市民和东北流亡同胞自发汇入队伍,市民送豆浆、医生护士为学生包扎伤口、报馆开放大门庇护学生,形成了社会各阶层支持学生、学生引领群众的生动局面^[43]。南下宣传团更是一路走村串户,向农民讲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分发油印小报,积极团结广大农民^[44],将党的政治主张转化为社会共识。

青年学生在跨阶层组织实践中展现出强大的创造力。面对工人,他们深入工厂,强调民族危机与劳动权益的紧密关联,使工人阶级把爱国抗战与自身解放结合起来^[45]。面对农民,宣传团则走村入户,揭示地主剥削与民族危机的内在联系,并以通俗语言唤起农民共鸣^[46]。对商界与市民,学生们通过街头演讲、散发传单,把党的抗日主张融入日常生活话语,赢得了商贩和市民的热烈支持^[47]。这种分层化、差异化的联结方式,有效实现了党所倡导的“全民抗战”理念,凸显了青年在跨阶层动员机制中的组织力与创造力。

青年学生群体在具体斗争中表现出高度的政治自觉和灵活的战术执行力。当党号召“到农村去”时,青年学生立即组织南下宣传团,深入华北农村发动群众,并采取散兵式行军方式突破封锁,显示出结合党的方针与自主创造的高度能动性^[48]。在“七君子事件”引发的“一二·一二”大示威中,北平学联则依据党的统一战线方针,自主设计全城交通网和“化整为零,由零集整”的游击战术及“头调尾,尾调头”的战术,使游行在强力封锁下依然灵活推进^[49]。这些表明,青年学生不仅是党的统一战线方针的忠实践行者,更是推动其落实的重要创新者和实践者。

一二九运动的历史表明,党的统一战线方针与青年主体性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辩证统一关系。一方面,党的政治引领为青年行动提供了方向,使其自发行动升华为自觉、有组织的跨阶层动员实践;另一方面,青年学生的先锋作用和创造精神,又反过来推动了党的统一战线深入人心,加速了全民族抗战共识的形成。

四、一二九运动动员机制的宝贵经验

一二九运动动员机制所彰显的历史经验,集中体现了党领导下青年动员机制的独特价值,具有深刻启示意义。它昭示我们,社会变革既需要广大青年的自觉参与,更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和科学指引。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与党的政治方向要紧密结合,才能汇聚成改变历史进程的

磅礴力量。回望这段历史,要从中把握党的领导与群众动员相统一的内在规律,坚持把青年主体精神与党的战略部署有机结合起来,激励当代青年以历史主动精神投身民族复兴伟业,把个人理想融入党和国家的奋斗目标之中。

坚持党的领导与青年主体性的有机结合是一二九运动动员机制留给我们的首要经验。一二九运动证明,青年自发的爱国行动若缺乏党的坚强领导和制度保障,往往容易分散而难以形成合力;而如果脱离青年主体性和创造力的组织安排,也往往难以获得社会广泛响应和持久动力。当前,青年参与社会建设仍面临路径分散、内在动力不足等问题^[50],这就要求在制度设计和运行全过程中,坚持党对青年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形成组织引领与青年自觉相结合、制度保障与社会实践相衔接的良性格局。一方面,要通过政策支持和制度供给拓展青年组织的活动空间,激发其主动性与创造性。例如,《社区青春行动方案》赋予青年项目自主运营权,保障其在志愿服务中的主动性与创造性。另一方面,依托“青年议事厅”“政策试验区”等制度平台,把青年的智慧和力量有效纳入国家治理体系,推动党的战略部署与青年群体的历史主动有机结合。如深圳前海梦工场让港澳青年深度参与创业政策制定,并将其孵化成果转化为区域发展政策,从而实现国家战略与青年创意的有机衔接。共青团“社区青春行动”通过制度化设计,既保留青年在志愿服务中的自主策划空间,又将其行动导向养老助残、乡村振兴等重点领域,实现基层首创与顶层引导的辩证统一。这不仅激发了青年内在动力,也确保了其行动与社会发展目标的一致性。事实证明,只有在尊重青年主体地位的基础上,把党的政治引领同青年的首创精神统一起来,并以制度化保障确保其稳定运行,广大青年才能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中坚作用,真正成为推动民族复兴伟业的生力军。

创新青年动员方式和宣传渠道是提升新时代青年动员机制效能的现实需要。一二九运动能形成全国性声势并产生深远历史影响,得益于其灵活多变的动员策略与贯通城乡的宣传网络,把学生、工人、市民等各阶层力量紧密联系在一起。今天,面对信息传播新格局和青年群体的新特点,必须在继承党的群众工作优良传统的基础上,积极推进线上线下结合、虚实互动统一的动员格局。一方面,要坚持“区别对象、分层动员”,在现实空间建设高校实践基地、青年志愿服务站点等实体平台;另一方面,要积极运用“青年大学习”“青年之声”等数字化载体,以沉浸式、互动式传播增强政策传导与青年反馈的良性互动,使党的主张以青年喜闻乐见的形式传递出去,推动主流价值与青年文化相互融通。只有不断增强传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才能在复杂的信息环境中更好地凝聚青年的思想共识和行动力量,把党的战略部署转化为广大青年的自觉实践。

推动青年把知识与能力服务于民族解放和民族复兴伟业是动员机制发挥作用的核心要求。在一二九运动中,青年学生把自身的文化素养转化为救亡宣传,把书本知识转化为抗日救亡爱国行动,表明个体知识积累只有通过党的领导和组织的渠道,才能升华为改变历史进程的集体力量。当代青年在政治素养、制度化参与和渠道畅通方面仍存在不足^[51],这就要求我们不断健全知识转化的体制机制。在认知层面,要善于运用新媒体平台,把党的政策主张转化为青年易于理解、乐于接受的话语体系;在实践层面,要依托高校、科研院所和产业园区等载体,把专业知识与国家发展需求紧密结合,形成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现实力量。如前海梦工场将港澳

青年的国际规则知识转化为大湾区制度创新动能;在制度层面,要畅通青年意见建议进入国家决策程序的渠道,使知识资源在党的领导下真正转化为治理效能。我们总结一二九运动动员机制的历史经验与启示,就是让当代青年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谱写绚丽的时代新篇章。

回顾一二九运动波澜壮阔的历史,青年学生以炽热的爱国情怀、卓越的动员智慧与自觉的救亡行动,为推动全民族抗战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他们以呐喊唤醒沉默,以行动冲破枷锁,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存亡紧密相连,深刻诠释了青年主体性在时代洪流中的磅礴力量。在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我们更应珍视并激发青年的历史主动精神。要通过强化思想引领、拓宽参与渠道、加大扶持力度、健全体制机制、完善制度保障,构建起青年成长与国家发展良性互动的现代化动员机制,使当代青年既能深刻认识民族复兴的伟大意义,又能充分发挥其主动性与创造性,把个人命运主动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进程中。唯有如此,才能让一二九运动所彰显的爱国情怀与主体精神在新时代继续发扬光大,凝聚起亿万青年团结奋斗的磅礴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持续而强大的青春动能。

[参 考 文 献]

- [1] 中国共产党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6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90页。
- [2] 中共郑州市委党史研究室:《谷景生与一二九运动》,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46页。
- [3][9][11][14][25][35] 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组《一二九运动史》编写组:《一二九运动史》,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第385、12、14、94、27-28、29页。
- [4][5][8][17][18][20][23][24][42][43][47][48][49] 武国友:《青春热血报国情 一二·九运动》,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105、29、55、86、104、37-38、54、56、29-30、46-47、29-30、73-74、116-121页。
- [6][7][27][28][29][30][31][33][34][36][37][38][39][40] 孙 钢:《一二九运动》,北京: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第18-20、24、18、18、19、19、19、6、6、12-13、12、126、127、127页。
- [10][13][15][16][46] 清华大学校史编研组:《战斗在“一二·九”运动的前列》,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60、14、17、27、30-31页。
- [12]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一二九运动》,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44页。
- [19][26][41][44][45] 北京师范大学校史资料室:《一二·九运动与北平师大》,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48、377-378、307-308、14、531-532页。
- [21][22] 《北京大学“一二·九”运动回忆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14、256页。
- [32] 吕登来:《一二九运动》,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1962年版,第23页。
- [50] 沈建良 王 雁 王新云:《“抱团共治”青年参与社区治理的问题与对策》,载《中国青年报》,2023年11月16日。
- [51] 张良驯 郭元凯:《青年政治认同与政治参与研究》,载《人民论坛》,2020年第24期。

(责任编辑:孔 庚)